

运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百家讲堂

探寻晋国历史文化密码

运城晚报讯(记者 王捷)为深入挖掘山西历史文化内涵,增进对晋文化的了解与认识,6月25日,运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百家讲堂开讲,特邀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吉琨璋作《表里山河 唐风晋韵——晋国的历史、考古与文化》专题报告,带领大家深度挖掘晋国历史文化内涵,领略山西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文化魅力。

活动现场座无虚席,听众们热情高涨。吉琨璋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丰富的考古经验,以通俗易懂、生动风趣的语言开启了这场文化之旅。他首先从晋国“表里山河”的地形地貌引入,让大家直观感受晋国群山环绕、大河奔流、山河互为表里的地理特征,点明这一特殊地形地貌为晋国发展提供的天然优势。

随后,吉琨璋巧妙结合大量珍贵的考古发现与翔实的文献资料,通过“叔虞封唐 唐在何方?”“燮父改晋 何以为晋?”“岁月静好 安守河汾——西周时期晋国”“尊王攘夷纵横华夏——东周时期晋国”4部分,层层递进,系统梳理了晋国从封地起源、更名,到西周时期稳固发展,东周时期成为春秋霸主纵横天下,直至战国初期走向分裂的整体脉络,生动解



◆吉琨璋先生在讲座中

▲讲座现场



读了晋国历史文化的形成、演变及其在中华文明中的辉煌历程和重要地位。

讲座中,吉琨璋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以多元视角,围绕叔虞、燮父、晋惠公、晋文公等重要历史人物,“桐叶封弟”“晋献嘉禾”“曲沃代翼”“城濮之战”“三家分晋”等历史典故,子犯编钟、叔虞方鼎、晋侯鸟尊、晋侯玉璧、侯马盟书等极具代表性的珍贵文物,陶寺遗址——唐尧部落、曲村——天马遗址、古曲沃闻喜上郭——邱家庄遗址等重大考古成果展开,深入探寻晋国背后蕴藏的历史文化密码,阐述了晋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在华夏文明演进中的深远影响和历史价值。

精彩的讲座让听众们受益匪浅,大家纷纷表示对晋国历史文化有了全新的理解和感悟。讲座结束后,不少听众举手提问,吉琨璋一一作了细致解答。“全盛时期的晋国包括今天山西全部、华北平原大部、中原北部、黄河西部,可以说在中华历史文明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听众张女士说,“这次讲座既有严谨的学术解读,又有充满趣味的故事,让我们对晋国、对山西、对运城的历史都有了更立体的认知。”

市三晋文化研究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开展各类文化交流活动,推动更多三晋文化研究成果走向大众,让更多人了解山西文化、运城文化,为地方文化不断传承创新发展,注入更多动能。

四系盘口陶罐
古朴遗韵的文化传承

□记者 王捷

在我国,陶瓷艺术可谓独树一帜,源远流长。其中,南北朝时期可以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随着胡汉风格碰撞、南北文化交融,南北方器型开始存在差异,直接影响了唐宋的器型分化,也为后陶瓷艺术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盐湖区博物馆就有这样一件北朝的四系盘口陶罐,以古朴的造型和精巧的细节,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北朝时期陶瓷技艺及社会生活的窗口。

古老的灰陶四系罐主要出现在南北朝和晋代,是日常生活中的盛贮器皿,用于储存粮食、水、酒等物品,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和生活方式。同时,它们也会作为明器出现在墓葬中,寄托着生者对逝者的美好祝愿,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死观念。不同规格、装饰的陶罐,可能还代表着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

盐湖区博物馆的这件灰陶四系盘口陶罐高19.8厘米、口径6.5厘米、底径7.7厘米,盘口的独特造型,既增加了器物的稳定性,又便于人们倾倒液体,可谓是实用与美观的完美结合。其为短颈,肩部开始逐渐变大,中间以下渐敛,平底,线条流畅自然,给人一种古朴大气的美感。

陶罐的“系”是器物肩部或腹部用于穿绳提携的环形或桥形小部件,兼具实用与装饰功能。这件灰陶四系盘口陶罐的肩部设置有四系,不仅方便人们使用时系绳悬挂、提拿、搬运,更是一种装饰元素,为器物增添了几分灵动之感和对称之美。

这件器物内外施有青褐釉,外壁施釉不及底,从中间一分为二,十分明晰。上半部分青褐交融,犹如青山远黛,色泽温润深邃,透着古韵,下半部分则露出未经釉彩修饰的陶胎,与上半部釉色形成鲜明对比,界限清晰但又和谐统一。在岁月的洗礼下,这件陶罐的釉面产生了温润的光泽,更显古朴典雅。

我国在新石器时代已有带耳、带提梁的陶罐。北朝时期,各民族交流频繁,文化相互交融,陶罐的造型和装饰风格,融合了中原文化的传统印记及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特色,体现了民族融合的时代特征。这件珍贵的灰陶四系盘口陶罐,展示了当时的陶瓷制作工艺和文化内涵,无疑对于后人研究南北朝时期陶瓷发展、民族融合等内容具有重要价值。

每每端详这件灰陶四系盘口陶罐,就会感觉到,这并不是一件普通的陶罐,而是一件仿佛能带领我们穿越历史的连接器,为我们提供了直观感受北朝陶瓷文化的奥秘和匠人智慧匠心的独特视角,也让我们对历史文脉的传承更多了一份敬畏。



主角:四系盘口陶罐

出生时间:北朝

尺寸:高19.8厘米、口径6.5厘米、

底径7.7厘米

藏宝地:盐湖区博物馆

文物
名片

新绛支社龙爪槐与薛仁贵征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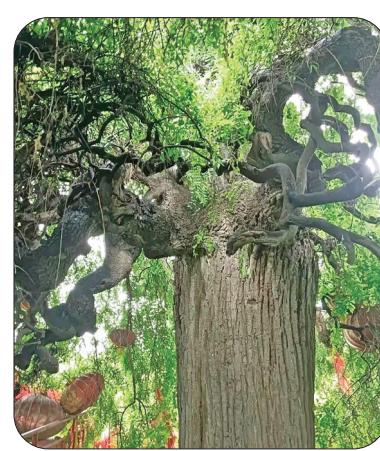
□张秋明

在新绛县最南端的峨嵋岭上,有一个历史悠久的村庄,名曰支社村。此村原名叫李家庄,东西临沟,南与闻喜接壤,西与稷山隔沟相望。唐安史之乱中,有一浙江姓人氏逃难来此定居,后支姓后辈日渐增众,遂改名为支社庄(即今支社村)。在村北部的不远处,有一棵唐代的龙爪槐,相传为当年薛仁贵征东时所植。

话说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藩属国高句丽王朝权臣渊盖苏文发动政变,弑君杀臣等百余人,专擅国政,对唐“不奉正朔”,并大举进攻唐属国新罗。唐太宗李世民听闻后十分震怒,发动了史上规模空前的征讨高句丽之战。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七月,李世民命令水陆并进,以唐将李勣为辽东道、张亮为平壤道兼行军大总管,统率战舰500艘、士兵4万、步骑6万,自山东莱州泛海趋平壤。

次年二月,唐太宗御驾亲征,自洛阳率军前往辽东。此时,李勣已率军渡过辽河抵达辽阳北部,李道宗也率部到达辽东城外。唐太宗在穿越200多里的泥淖地带时,因长途跋涉、人困马乏,又遭遇高句丽军围追



堵截,前后夹击,被困于辽东越虎附近(今辽宁海城市)不能自拔。

时任右武候大将军的尉迟恭奉旨急赴薛家军宿营地绛州府薛店(今新绛县支社村南)调薛仁贵前去救驾。途中,尉迟恭看薛仁贵义薄云天,有凛然正气,便收薛为义子。二人在路过支社地界时,共植了一棵龙爪槐,以昭示“父子”之情。

随后,薛仁贵率领薛家军与尉迟恭星夜兼程,扬鞭策马,很快便与几路唐军会合。唐军几路进发,势如破竹,打败了高句丽军,救出唐太宗李世民。

薛仁贵率领将士们乘胜追击,奋力厮杀,大破辽东城门。此时,高句丽军已无力抵抗强大的唐军攻势,纷纷投降,辽东城终被唐军攻下。

唐高宗元年(公元668年),唐军攻克平壤,高句丽灭亡,至此征讨高句丽战役以唐军完胜而告终。唐军班师回朝后,薛仁贵因战功卓著,被封为平阳郡公和右威卫大将军。尉迟恭忠心护驾,被封为鄂国公,还被民间尊为祈福求安的门神,与秦琼一道守护华夏百姓的安康。

支社村这棵龙爪槐凭借薛仁贵和尉迟恭之名而名声大噪,大树也有了“将帅”之霸气,周边百姓也视其为护佑家园、祈求平安的“守护神”,每逢五一、五便纷纷前来祭拜。

现今,支社村这棵龙爪槐经过当地政府和老百姓的全力保护,越发显得“雄壮威武”,枝繁叶茂。林业部门也将此树确定为一级古树名木进行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管护,为古树撑起一把坚实的“保护伞”,为当地文旅发展增添新业态。

有诗云:“唐王困越虎,右将急当差。绛州调薛礼,父子同灌埋。荏苒千百载,沧桑支氏槐。遒根深百尺,郁冠广张开。龙卧趾爪隐,凤栖羽毛哀。只听雪雨落,不望烟云台。”